

绪 论

百年语言文字之学的暮鼓晨钟

第一节 泽被百年的语言文字学 三大奠基之作

当历史的车轮驶进 1900 年,20 世纪的晨钟敲响时,一门新兴的学科正悄然而生。晨钟宿晚,已有上世纪的暮鼓擂响,那就是晚清学术的高峰——1898 年《马氏文通》的问世。《马氏文通》最直接的意义,当然是标志着中国现代语法学的诞生。前此作为旧经学的附庸,音韵、文字、训诂大都以个别形态存在,但也有较系统的研究。最缺乏的是语法研究,除虚字以外,还谈不上语法的认识。《马氏文通》模仿西方语法,改变旧学观念,以模仿和变古并重、互补,在晚清西学东渐中将中学嫁接到西学,结出令后人永受裨益、咀嚼不完的硕果。事实上,《马氏文通》不仅属于语法学、语言学,而且属于整个中国近现代学术。不错,它是讲汉语语法学的,但它也讲了语义逻辑、语法逻辑、语言教育、语言哲学、文化学等问题。《马氏文通》是晚清学术史上的一颗明珠。上个世纪之交的暮鼓晨钟,催春语坛,从此宏辞伟论,绵绵不绝,使中国现代语言学在扬弃了古代语言学、语文学之后,以崭新的面貌、庄重的步伐登上了现代学术的讲席。

在晨钟金奏中,还应提到章炳麟对现代“语言文字学”大范畴

理据、定义框架的确立之功。1906年章炳麟、章绛在旅日接触西方哲学、普通语言学说以后发表《论语言文字之学》一文提出要将传统的‘小学’改为‘语言文字之学’。^①章说：“合此三者（按指古代的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乃成语言文字之学。此固非重占毕所能尽者。然犹名小学，则以袭用古称，便于指示。其实当名语言文字之学方为确切。此种学问，仅《艺文志》附入六艺。今日言小学者，皆似以此为经学之附属品，实则小学之用，非专以通经而已。”后来又将该文中“语言何自起乎”以下修改收入《国故论衡》卷上，题为《语言缘起说》是《论语言文字之学》的下篇。^②故可合并而观之。王宁教授认为改“小学”为“语言文字之学”这“不是简单的易名，而是标志着这门学科的根本变化”；“确定了它的研究范围，找到了它在近代科学中应有的位置”并“为它向近代的理论科学发展奠定了有利的基础”。在此基础上，章氏扬弃旧小学提出了有关语言文字学的许多理论课题，例如“语言缘起说”讲语言发生时的原始状况，“转注假借说”讲文字依赖于语言发展而发展的基本规律。^③还有若干涉及汉语语音史、古音学、方言学等课题。

章炳麟1906年6月29日赴日。9月在日本创办国学讲习会。讲习会会刊《国学讲习略说》即已收入章氏《论语言文字之学》一文，该刊1906年9月由日本秀光社印行。后又刊于国内出版的《国粹学报》丙午年（1906）第十二号、第十三号，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一月二十日、十二月二十日出版。参见《章太炎年谱长编》汤志钧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09、216、239页。有关章氏在日本接触西方学说的情况，参见该书第230页。又见赵振铎：《中国语言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43页。

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卷，第240页。《国故论衡》1910年5月初版于日本，而收入其上卷的《语言缘起说》被《太炎集》系为“丙午（1906）文”。

参见陆宗达、王宁、宋永培：《训诂学的知识与应用》，语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96页。

其实章氏 1906 年的《论语言文字之学》、《语言缘起说》以及 1910 年《国故论衡》上卷里的其他论文是上世纪初语言文字学含汉语史学的理论奠基系列之作，是章氏的一个理论系统。1912 年章炳麟的学生胡以鲁、仰曾发表《国语学草创》。胡留日归国后曾在北京大学开设‘国语学’课程，《国语学草创》是他在北京大学讲义的基础上形成的。^①章炳麟撰序云：“余向者病世人灭裂自喜，字母等韵、六书略例，皆所未达。苟欲乡壁虚造，以定声格，成简字，辄私鄙笑之。尝为声韵对转之图，撰次二十三部，补东原《撮约》按：孔广森所未备，而仰曾综贯大槩，按罗马、牾唇之书（按：佛书），时时从余讲论，独有会悟。今见其书，乃为比合音理，别其龠舒。音有难喻，以珊斯克利及罗甸文按指梵文及拉丁文，参伍相征，令古今华裔之声，奄然和会，斯治语学者之未及也。”这显然是说，光研究古音分部，光研究汉语史还是不够的，而不懂得汉语的历史也在谈拼音、简化，那是十分可笑的。应当像胡仰曾那样，善于和西语、域外语言作比较，从世界语言学的角度看汉语，才是正确的途径。章氏《序》还说：“迩者以统一语言有所发舒。古之正音，存于域中者，洋洋乎惟江汉大鄂之风，其侵、谈、闭口音，宜取广东补苴之。异时经纬水陆之交，凑于汉上，语言旁达，天下为公。今者考文正读，宜逆计，是以为型范。斯余畴昔所论，而仰曾亦有取焉。既抽其大旨，乃为叙录，以告国人治语学者。”这里，章氏赞扬胡以鲁“统一语言”的思想，当时拟以武汉话为通语；调查方言并求古之正音”的思想，“统一语言”裨益于“天下为公”的思想，并认为仰曾的做法是“逆计以为型范”，即提前考虑“天下为公”实施后的语言规范和语言统一问题。作为一种见解，章氏《序》最重要之点有二：一是从世界语言学的视角看汉语的研究，二是语言规范、语言统一一

见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61 页。

题。亦即语言研究中的国际化和语言本身的规范化。章氏认为这二者值得“以告国人治语学者”让他们看清汉语研究的方向和途径。章氏的见解，对后来的语言研究很有指导意义。章氏表彰的胡以鲁《国语学草创》是“中国第一部理论语言学著作，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理论语言学的诞生”。^① 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努力，我国出版的理论语言学著作不下两千种。^②

为 20 世纪语言文字学奠基的著作，还有 1915 年即开始出版的高本汉著的《中国音韵学研究》实际上中译本译者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不是一般的翻译而是对原著进行了再创造。^③ 原作距《马氏文通》不过 17 年，距章炳麟《语言文字学》说不过九年，距《国故论衡》不过五年，距胡以鲁第一部理论语言学著作不过三年，应该说该书的最初问世是很早的。特别耐人寻味的是，三部奠基之作马著、章著和高本汉、赵元任等的著作都是在中西合璧、中西互补中产生的。三部著作都对语言文字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马氏文通》为始源，它的后继者们，一大批著名学者如吕叔湘、朱德熙、胡裕树、陆俭明等形成了现代语法学的百年系列，以章氏学说和章氏弟子黄侃的发展形成的章、黄之学影响和指引着一大批章、黄弟子和著名学者，如陆宗达、洪诚、黄焯、徐复、赵振铎、王宁等不断进行新的开拓。以高、赵、罗、李著论的《中国音韵学研究》为轴心，形成和造就了以王力、李荣、郭锡良、唐作藩、何九

邵敬敏、方经民：《中国理论语言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3 页。

陈保亚：《20 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书末列出的有关语言学方法和方法论的中文版著述已达 1078 种。陈著列出的还只是一部分。

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法文）于 1915 年开始出版，共分四次出版（1915、1916、1919、1926 年），至 1926 年完成。中译本 1940 年初版，1948 年再版。

生的原理看“，依类象形之谓文 形声相益之谓字。”以上与许慎《说文叙》的说法完全一致。文字产生后不断发展 也须不断纠正：“阅世递变而相沿 讹谬至不可殫极。”上古文献渺茫难求 汉承秦火之失 许慎、郑玄辈起“，务究元本”竟以小学为初始起点和工具。从汉代起“，小学旁分 各有专门”至清代小学三科大备。三科对各自的研究对象“求其至当”但“欲以屡变之后以返求其未变之先，难矣”原因是“所以证其未变之形与声者 第据此已变者耳”。而“形声变犹有不变者 就集字成句者也”。在马氏看来 音形义都容易变化，唯语法“历千古而无或少变”。马氏选择此为研究对象。有关语法观念，《易·艮》“艮其辅 言有序”，《诗·小雅·都人士》“出言有章”，《释名·释言语》“文者 会集众字以成锦绣 会集众字以成词谊 如文绣然也”。马氏认为这些都孕育着语法观念。历史上有关系形字声的书很多 而语法观念“其道终不变者 则古无传焉”。《礼记·学记》“离经辨志”一语，《通雅》引作“离经辨句”。但蒙子入塾 终日听塾师伊吾 涉及语法问题 谁也说不清 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长此以往，“将何考艺而问道焉！”《马氏文通》一书，“正名”冠其首 预为条例 此做法古已有之 佛像不匱 但马氏皆为成立界说 定义对象而正名 是近代西方逻辑的移用。马氏把他的语法学说列入“可授受者规矩方圆”以“可授受者”深求“不可授受者心意营造”由语法探求心智 马氏试图将汉语语法唯理化，一般说这是可以理解的哲人、学者的常规心态，马氏的做法几乎贯串全书。

《后序》实际上是讲唯理化。马氏引《荀子》“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群”就是能发生一定的社会联系 语言是“群”的社会手段 音、形、义经“九译”而相通 唯有不同“文词而属比之 见其字别种而句司字，所以声其心而形其意者，皆有一定不易之律”，“于是因所同以同夫不同者”。“不易之律”“所同”都是指语法 其常居不变 其唯理性则尤执著而明显。马氏设问 西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 而 19 世纪末叶的中国“上下交困”窥视凯觐“，环

而问者与国六七”已是“岌岌乎”殆哉”识时务者”方将孔孟西学，
 刍狗文字”何需劳精精神 从事此语法研究 冯氏的回答是 古来
 文以载道 但文法还不是这个“道”，文者 所以循是而至于所止，
 而非所止也 故君子学以致其道。”也就是说 文法是学习“文以载
 道”中的那个“道”的工具。马氏认为西方的孩子很快就学会文法，
 以更多的精力去学习数学、理化、法律、哲学等。于是 马氏要“为
 之比拟而揭示”汉语文法，让中国的孩子也能尽快学会文法，以更
 多的精力去学习数理化、法哲经，“以与夫达道明理之西人相角
 逐”。当然，马氏把学会语法看得太简单了。把语法唯理化，用语
 法所包含的逻辑、哲学思想“自群”，不为他群所群”使之越出语
 言文字学之外 把语法的作用也看得过重了。《例言》对该书“首正
 名 次字 词 类 次句读”的本旨 泰西“葛郎玛”的性质 虚实字的
 词气解释方法，引书证的范围和体例格式一一作了交代。总之，
 《马氏文通》序、例三篇探讨了国学中的语法观念、语法的唯理性、
 为“载道”所用的工具性和学习语言的作用、“群”的社会作用，《马
 氏文通》作为语法书的本旨、性质、体式等 对高屋建瓴地把握语法
 的性质，指导后人研究语法、学习语法都有一定作用。

二是首次建构了汉语语法体系。就大的方面而言，共分正名
 卷、实字 词 卷、虚字 词 卷、句读卷。全书第一句话即蕴涵《左
 传·襄公二十四年》“三不朽”之说《论语·子路》正名《荀子·正名》
 “名定而实辨”的“名辨”逻辑 引用西方逻辑学中的据概念内涵下
 定义之说，称：“凡立言，先正所用之名以定定义之所存者，曰界
 说。”对汉语语法范畴中的一些主要术语 实字 词，下同 与虚字，
 名字、代字、动字、静字 形容词、数词 状字 貌动静之容 较复杂，
 不唯副词 介字、连字、助字、叹字 句、起词 犹主语 语词 犹谓
 语 内动词 后不带宾语 外动词 后带宾语 止词 犹宾语 表
 词 表判断意义的动词后的宾语 次 位次 主次 起词位 宾次
 （止词位）正次 相对于偏次言 偏次 相对于正次言 司词 介词

宾语)读有起、语两词但辞意未全者(犹分句、词组),一一下定义 共立界说 23 条 其中词类 12 条 句和句子成分 4 条 位次和读 7 条。在句中 主语、谓语、宾语也就够了,一考虑分句、词组 马氏认为就得引进位次。马氏的‘次’语法范畴“只是说它表示名代诸词与其他词的相互关系”。“由于汉语的特点 在表示这种关系时不依靠词形变化,《马氏文通》就是注意到名代诸词在句读中所序之位才立‘次’的。”①

实字 主要分名、代、动、静、状。前三类较纯 静字含形容词、数词 状字几乎各类词、词组、分句皆可。可见体例未纯 有待改进。重要的是 马氏划分词类的标准是什么 例以名词“名字所以名一切事物者 省曰名。”并举例说名词就是毕赅一切‘事物’的。可见以概念 意义 划分词类 并按概念把名词分成公名(普通名词)本名(专用名词)公名再分成两类 群名(集合名词)通名(抽象名词)说通名为“所以表事物之色相者 盖离乎体质以为言也”,也是以概念说的。不过,马氏已经认识到句法功能对划分词类的意义“用为起词、止词、司词者 皆可以名名之。”但又无端扩大范围 把名词性词组也当作名词。应该说 马氏除以概念或意义作标准以外 也是懂得以句法功能为标准的。又如代词 定义是“代字者 所以指名也 文中随在代名而有所指也。”应当说 这是划分词类的语法标准。把代词分从指名代字、接读代字、询问代字、指示代字 也是从语法关系、语法作用入手划分的。更具体的考虑 如论指名代词中的‘吾’。发语者 指第一人称)‘吾’字 按古籍中用于主次、偏次者其常 至外动后之宾次 惟弗辞之句则间用焉 以其先乎动字也。若介字后宾次 用者仅矣。”② 这分明是以分布和语

林玉山:《试论 马氏文通 的‘次’》载张万起主编:《马氏文通 研究资料》中华书局 1987 年版 第 277 页。

② 马建忠:《马氏文通》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 第 43 页。

法功能讲论指名代词‘吾’的用法。又如动词定义是：“凡实字以言事物之行者曰动词。”此以概念为准，具体而微。如说外动词：“其动而直接乎外也，曰外动字。而凡受其行之所施者，曰止词。言其行之所自发者，曰起词。”动词之行，可以‘施’‘受’二字明之者，有由矣。”^①可见立外动词的标准是有否‘受其行之所施’的止词。动词的性质决定于“施”“受”，取决于主词、止词，方可断其为语词（谓语）。我们认为，《马氏文通》在词类的一般抽象上，划分标准重在概念，尤其是‘正名卷’的界说部分，在具体论述该词类及其下位分类时，更接近于语法标准。朱德熙先生在讲到划分词类的标准时说：“词类是反映词的语法功能的类。但是根据语法功能分出的类，在意义上也有一定的共同点。可见词的语法功能和意义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不过，我们划分词类的时候，却只能根据功能，不能根据意义。”^②马氏的双重标准如何纠正，是否有助于理解“功能和意义之间有密切的联系”，朱先生实际上已作了很好的回答。

三是对若干语法范畴的订定。《论句读》一卷以《周易》的《彖辞》和《系辞》为纲目，作‘彖’、‘系’两个层次论述了起词、语词、止词、转词、顿、读、句型七大范畴。“彖”为判断、下定义，“系”为深论缕析成统系。其内在逻辑为判断和推理两部分构成。

关于转词，是指动词后作补语用的介宾结构或其他结构和词。马氏以语义为准绳对转词分类，极富方法上的启发性。表处所的转词有有介、无介之别（例：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记时转词无介词（例：《左传·僖公四年》“姬真诸宫六月”一语中的“六月”），记价值、量度、里数、距离之文无介词（例：《庄子·逍遥游》“请买其方百金”），记事之所以、所为有介词（例：《孟子·离娄下》

马建忠：《马氏文通》商务印书馆 1983年版 第 144 页。

朱德熙：《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 1982年版 第 38 页。

“以其乘輿济人于溱洧”），但转词这一语法范畴是有缠夹的。上例以补语或说“副词性宾语”、“目的宾语”称之，^①而下例《左传·昭公三年》“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则又用介宾结构作状语。^②但马氏从语义和语法的结合研究汉语范畴及其分类，则在方法上有启发意义。

关于顿 是指朗诵时的语气停顿。“顿者 所以便朗读 于句读之义无涉也。”顿与读是两个不同范畴的东西，“读”是语法的，“顿”是语气的。但中国古代从辞气研究虚词，也等于说以辞气研究语言表达法。《马氏文通》以“顿”作为语法范畴 是对传统修辞语法的继承 也是从汉语表达的实际情况出发 针对汉语特点提出的研究办法。传统修辞语法从辞气研究虚词，这本身就说明辞气和语法不可分。故马氏一方面说顿“于句读之义无涉”另一方面又说“然起词、止词、转词 与 举 凡一切加词 其长短之变 微 无 顿将安归焉”^③在实际研究中，顿与读往往是一身而二任。马氏主要从句读、句子成分来认识顿。《马氏文通》有“起词有为顿者”、“语词有为顿者”、“同次有为顿者”等说法 都是这种情形。从句子成分认识顿，说明顿是独立的研究对象和语法范畴，不只是语法手段。《马氏文通》关于顿的专题研究，有重要意义。哈里斯曾说：“就英语而言 可以说出现的语句由短语语调组成。”赵元任曾试图从停顿来说明句子的独立性：“一个句子是两头被停顿限定的一截话语。这种停顿应理解为说话人有意作出的。”并把停顿（pause）、停顿助词（pause particle）作为“重要术语”。^④有的学者还专门研

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83 页。

马建忠：《马氏文通》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403 页。

马建忠：《马氏文通》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404 页。

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第 40、41 页。

究‘语气和口气’与现代汉语语法的关系。^①可见反映一定语气和语调的顿、停顿确为语法研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马氏的顿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读。读既是“语法结构单位”又含分句和词组，不只是主谓词组两大类。^②马氏对“读”的分析，于汉语研究有指导作用。接读代词“者”、“所”形成的“者”字结构、“所”字结构皆为读。此外，被马氏视作主语的“其”所形成的词组或分句也是读，“其”也被看作接读代词。用介词（或称代词、助词）“之”取消句子独立性而成的偏正词组结构（例：君子之志于道也……）用关联词语“若、那、如、使、虽、纵、曾、以、为”连接的分句或词组（皆辞气未完者）为读。至于读的作用，用如名字（作起词、止词、转词），用如静字（作表语），用如状字（状时、地、记情状），对读的研究，无非从构成、语法作用（含语义作用）研究，马氏用语义、语法结合法研究词组，启发多多。

句。句从两方面定义。一是主谓双全，二是辞已达意。马氏分句子为两类：一类与读相联系，一类舍读独立（指与顿与转词相联系的）。也就是由词或词组组成句，或将此看作由顿来识别句子。^④后者正是前面提到的赵元任的句子说。由顿识别句，马氏分析为排句顿、叠句似排顿。^⑤至于表比较或选择的复句，表承接和并列的复句，则主要看作由读（此处为分句）构成。^⑥《马氏文

参见孙汝建：《语气和口气》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9 年版。这里引用哈里斯、赵元任的说法，强调“顿”的重要性，都从孙著受到启发。

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81、82 页。

马建忠：《马氏文通》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412—417 页。

马建忠：《马氏文通》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429—435 页。

马建忠：《马氏文通》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429—433 页。

⑥ 马建忠：《马氏文通》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433—436 页。

通》论句，已涉及复句问题。马氏对复句的认识，一是涉及复句类型，二是涉及复句的各分句间的关系，三是复句的构成读或顿而标识之。实际上复句的分析全部可看作读，以顿识之，可明分句间的辞气，不无可取之处。应该看到，《马氏文通》对复句的认识是初步的，但也是复杂而深刻的。对后人研究复句良多启示。

第三节 章炳麟语言学奠基新概念及其著论

章炳麟 1906 年《论语言文字之学》的奠基作用 学术界曾给予很高的评价。何九盈曾认为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① 赵振铎则认为“不仅只是一个单纯的名称的更改”而是属于“新的语言学”术语和学科。^② 总之，章氏新概念既是理论语言学，也包括汉语史，包括对象本体研究的学术史，即语言学史。章氏的“语言文字之学”是 *The Linguistics and History on Chinese Language and Writing*，其含义是十分深刻的。如前所说，章氏《论语言文字之学》一文从“语言何自起乎”以下，经修改而收入《国故论衡》卷上，题为《语言缘起说》。赵振铎曾专门评述该文：“‘语言缘起说’论述了语言的起源、语言的语音变化等问题，特别是这一篇的后半部分与德国缪勒 (Max Muller, 1823—1900 年)《语言科学讲义》第二编论词根的话基本一致。”赵还说，章氏读过缪勒的书，赵找到的内证是章氏在《检论·论文》篇附录“正名杂议”中说：“马格斯牟拉以神话为言语之癭疣”这句话就出自缪勒的《语言科学讲义》。章氏所谓马格斯牟拉就是 Max Muller 的译音。《语言缘起说》后半部分

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1 页。

赵振铎：《中国语言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43 页。

的内容明显地引用了缪勒的这部书。^①《语言缘起说》乃至《国故论衡》上篇全书都是申论《论语言文字之学》的。《国故论衡》上对汉语言文字之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都作了理论上的阐述，产生了深远影响。论述的对象是国故，“论衡”之“衡”为参照点，制衡区，坐标值，那就是来自西方的普通语言学，如赵先生所说，受缪勒的影响尤多。

《语言缘起说》（1910年）中最直观的问题，就是事物的得名之由，事物之名称是约定俗成的。但名称与名称之间是有联系的，特别是同类事物的名称之间、初名和后名之间是有联系的，这是求同源字词的理論依据。章氏《语言缘起说》并非讲名称和事物或概念的关系，而是讲起名的认知过程，而且这种认知又只是就大类别，即事物的大类别和名称的大类别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上讲的。像那些拟声词，“诸言语皆有根，先征之有形之物，则可睹矣。何以言雀，谓其音即足也。何以言鹊，谓其音错错也……”章又说：“物之得名大都由于触受，触受之噩异者，动荡视听，炫惑荧魄，则必与之特异之名，其无所噩异者，不与特名以发声之语命之，夫牛马犬羊，皆与人异，故其命名也亦各有所取义。”以发声来称动物。章氏既要经“语言缘起”阐述其语源说，就不能不落实在名与名的关系上。通观全文，章氏列出的有音义联系的字有雀/足/鹊/错/雅/亚/雁/岸/马/武/牛/事/羊/祥/狗/叭/人/仁/鬼/归/神/引/祇/提/天/颠/地/底/山/宣/水/准/火/毁/土/吐/金/禁/风/汜/侯/猴/爰/媛/佳/蚩/渠/虞/蠻/闽/髻/髦/苗/羌/戎/人/夷等等。

此外，章氏的《小学略说》（1910年）从说“六书”入手，述文字的产生为“依类象形”“至于‘形声相益’”，“文”为物象之本，“字”为孳乳渐多。颇含上古“类逻辑”、“由象制名”、“以象释名”的认识规

则。章氏认为 古字以假借音变而多讹 故董理小学 尤当以音韵为侦伺军情的‘候人’。治音韵又当以《广韵》下证今音 上推古韵。清儒古韵分部 蔚为大观 然用于推寻故训 以段玉裁的成就最高，王念孙、郝懿行相次。章氏以小学为‘国故之本 王教之端 上以推校先典 下以宜民便俗’并非‘引笔画篆 缴绕文字’而为此巧饰而捷径窘步者 章氏举出王安石、王夫之、王闿运三人 其共同点是不求文字的脉理 声音 结果犹聋哑人看书。章氏以‘音韵相依 妙入无间’为‘大道’于是作《文始》以明语原。从《成均图》到黄侃古韵二十八部通转之说 到王力《同源字典》韵表 纽表语转之说，绵绵进于完善。

《一字重音说》（1910年）是讲双声或叠韵中的第二个字往往兼有第一、第二字的读音 则第二字有两个读音 故谐。例：《说文》焦 僂 僂本字 焦借音字 不造焦 则知僂有焦、僂二音。黽 勉 勉本字 勉兼有黽、勉二音。诘 讷 讷本字 讷兼诘、讷二音。章氏此说的理论意义在于说连绵字仅为记音，而不表义，故借同音字为之，不必另造既表某音又表某义的字。连绵字的第二字有两个读音，这对于研究上古的声纽和韵部都有莫大的意义。

《古今音损益说》（1910年）称顾炎武古无麻部 段玉裁古无去声 王念孙古盍部 緝部有入声而无平上去 至部 月部有去入无平上 钱大昕古无舌上音、轻唇音 如以方音证之 并与梵语音、俄罗斯音对照 可知顾、段、王、钱诸说不误。标题本身就能说明古今语音对照有增、损 是语音史的变化。历史语音的变化 以共时之方音、域外音证明之。在古无去声问题上 归之为发音方法：“中国上世无引音 发音易直 故曰郑声。”无引音者 即不能有去声矣。“古无舌上、轻唇 是因‘蹙口呼之 声不暴出而清亮如鸣蝈蝈。此外吟啸 非语言也 语异于啸 故无上腭、轻唇之音矣。”至于王念孙古韵说 章氏认为：“余以他部古无入声 入声于古皆为平上 独盍、緝、至、月为入声 古者入声与平上不相丽 各为部曲 故盍、緝、至、质）

月不通于诸韵。’^① 仅从四声考察盍、缉、质、月四部‘不同于诸部’却不从阴声韵、阳声韵、入声韵三分相配说之 等于说明了章氏本人与王念孙取同一考古派立场，而不取审音派立场。而事实上 王念孙早年的至部（晚年的质部）早年的祭部（晚年的月部）除入声外，还有去声。

《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1910年）全文以古训、读若、谐声偏旁、古今字等材料 证明中古的娘日二纽在上古归泥 是对上古声纽研究的重要创获。在方法上继承清儒，通篇实证，共举 38 个证据以证之。

《古双声说》（1910年）。上古声纽问题的研究除钱大昕古无舌上音 古无轻唇音 章氏娘、日二纽归泥说以外 经偏旁、古训、异文等举证古双声字 又古双声 实际上是古声纽相近者 阴上古声纽间的内在联系 尤得喉、牙互易 喉牙音与舌上音、齿音、唇音间的联结 进而“喉牙贯穿诸音”是上古声纽系统内部通转之先河。

《转注假借说》（1910年）为辨《说文叙》转注、假借说而作，要点有 转注、假借亦为造字之法。后人以同训、互训为转注 非六书的转注 后人以同声通用为假借（通假）非六书之假借。文字孳乳渐多 各循其声 以双声或叠韵为规约更别制新字 此谓转注 文字节制 以义不同而音相切合者借之 此谓假借。《说文叙》说转注“建类一首”之“类”为声类，“首”为语基。除“考、老”以外 章氏又举出古音同部而义近互注之字四组共 133 例。批评朱骏声以引申为转注 章认为引申正是《说文叙》说的假借。章氏关于转注、假借之说为后人的研究留下了新的课题。章氏论转注假借的目的仍为探寻语源（同源字）

以上七篇 事及国语之古今 就方法而言 综清代考据和西学之实验 而重实证 且著论成文 讲究条分缕析 逻辑性极强。就内

容言，研探汉语的物质外壳语音系统，特别是古音系统的内在规律。从语音与意义的联结入手，将古音应用于求同源字，仍是关于汉语内部系统性和规律性的探索。后来章氏弟子黄侃处处发挥章氏求系统性、规律性的思想。语音有《音略》和《声韵略说》，文字有《说文略说》，训诂有《尔雅略说》。无不言门类科学和对对象研究的系统性和内在规律性，并重视相关资料的采集。将传统小学的“订工”夫转变成治“语言文字之学”的求实态度。章、黄的学术精神，对后世的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影响极大。

第四节 高本汉及其《中国音韵学研究》 对汉语史学的影响

高本汉 (Bernhard Karlgren 1889.10.5—1978.10.20) 是国际著名语言学家、汉学家，瑞典人。他认为：“没有一种学术的领域比汉学更广的了。”但汉学家们的兴趣大都集中在中国历史学、考古学、美术和宗教方面，而他本人对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学情有独钟。他说：“至于语言学方面，因为表面的干燥，缺少引人的地方，所以没有鼓励起同样的兴趣，这是无足怪的。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汉学比任何别的科学需要语言学的地方更多。”^① 高本汉把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研究看作他的语言学研究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高本汉年轻时就有非凡的语言学才能，15岁时就开始做描写方言的工作，19岁发表了《瑞典南部方言同中部方言的分界线》论文。在乌普萨拉 (Uppsala) 大学求学时就深受斯拉夫语言学家、方言学家隆德尔 (J. A. Lundell) 的影响。1909年大学毕业，在隆德尔的推荐下获奖学金，遂于1910年2月来中国研究汉语方言，在中

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商务印书馆1994年缩印第1版。见《绪论》首页。

国逗留两年。1915 年获 Upsala 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15 至 1918 年在 Upsala 大学任副教授,1918 年起任哥德堡大学远东语言文化教授,1931 年起任哥德堡大学校长,等等。高氏在中国两年期间,先以数月工夫学会汉语口语,不久又掌握了书面语,以后不辞辛劳亲自走访各地,口问手写,调查了 24 个地点的汉语方言,记录了 10 万多个字音,获得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将调查到的资料带回欧洲以后,高氏开始了他的整理工作。他的参照背景或指示工具就是《广韵》的反切和宋代的音图。通过对 24 个地区的方言资料的整理,归纳出中古汉语的声纽、韵部系统。但还不够,又通过各方言的读音以及日语吴音、汉音、朝鲜译音和越南译音,给出了中古汉语各声纽、韵部的音值,并追溯它们各自从中古到现代的演变过程。这一中古汉语语音史研究的巨大工程,最后以 1926 年竣工的《中国音韵学研究》而宣告结束。甚至与此同步,高本汉开始他的上推上古音的工作。从 1923 年到 1940 年,先后发表的专治上古汉语的论著有:《中日汉字分析字典》(*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1923 年)、《上古中国音之中的几个问题》(*Problems in Archaic Chinese*, 1928 年)、《藏语与汉语》(*Tibetan and Chinese*, 1930 年)、《诗经研究》(*Shi-King Researches*, 1932 年)、《老子韵考》(*The Poetical Parts in Laotsi*, 1932 年)、《汉语词类》(*Word Families in Chinese*, 1934 年)。到 1934 年,高本汉已基本完成上古汉语拟音工作。最后,高本汉把他对上古音构拟研究的成果写进了词典《汉文典》(*Grammata Serica*, 1940 年,修订本 1957 年,修订本译本 1997 年)。1915—1926 年的《中国音韵学研究》是研究中古汉语的出色成果,还包括 1922 年发表的《中古汉语古音构拟》(*The Reconstruction of Ancient Chinese*)。中译本有林语堂译的题为《答马斯贝罗论切韵之音》,载林氏《语言学论丛》。这篇文章主要是答复法国汉学家马伯乐 1920 年发表的《唐代长安方音》对《中国音韵学研究》的批评。正面阐述和反批评,共同构成高